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Shijie
Zhuming
Zhhexuejia
Xiaozhuan
CongShu

Fontana Modern Masters
JUNG Anthony Storr

荣 格



Anthony Storr

JUNG

Fontana Modern Masters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安东尼·斯托尔 著

吴琼 译

荣 格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1998-041 号

原文书名:Jung
原文作者名:Anthony Storr

Jung:Fontana Modern Masters
Copyright ©1973 by Anthony Storr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1999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Kunlu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k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格/(英)斯托尔(Storr,A.)著;吴琼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1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ISBN 7-80040-357-2

I. 荣… II. ①斯…②吴… III. 荣格,K.(1875~1961)-传记
IV. B522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83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6元(膜)

目 录

第 一 章	生平背景	(1)
第 二 章	早期著作	(20)
第 三 章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	(34)
第 四 章	心理类型以及心理的自我调节	(58)
第 五 章	个体化进程	(76)
第 六 章	自性概念	(91)
第 七 章	荣格对精神治疗的贡献	(105)
跋		(117)
参考书目		(118)

第一章

生平背景

本书主要地是论述荣格的思想，而不是荣格其人。但是，由于——尤其是在动力心理学领域——要把思想和提出这些思想的人的人格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荣格其人作一简单的介绍。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Carl Gustav Jung) 出生于 1875 年 7 月 26 日。他的父亲是瑞士新教的一位乡村牧师，也是一位东方和古典学者。根据荣格自己的叙述，他的父

亲和蔼、宽容、大度。不过，他也有点因循常规，满足于接受熏陶已久的宗教信仰体系，对赋有才华的儿子的各种刨根问底的疑问总是无言以对，或者就是不加理睬。荣格描述他的父亲为人性格懦弱。确实，他竟然说，在孩提时代，他就曾把“父亲”这个词不仅和依靠而且和软弱无能联系在一起。从他自己的描述来看，荣格无疑属于那种出身于母亲要更为强干有力的家庭的一类，这种人不可小视，往往具有创造性，这一点在荣格的心理学思考中将反映出来。

在下面，我们不可避免地将会时常把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拿来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比较。这样做部分地是因为这两个人开始曾有过一段亲密关系，而后来又分道扬镳了；还部分地是因为弗洛伊德那远比荣格更加为人所知的观点可以为我们评价后者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或对比。

对于母亲，荣格的描述是，她疑虑重重，捉摸不定，而且还表里不一，因为她时常会发表一些普通平庸的见解，而另一方面，她又会自相矛盾地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方面；因此，荣格早早地就意识到她所说的常常并不就是她真正所想的，因而她是一个分裂的人。另外，在荣格大约三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因病——荣格后来把这归咎于是婚姻中的不幸造成的——离开家住了几个月的医院。这个小男孩对这次分离的反应是患了一次一般性的湿疹，这种皮肤病通常被认为部分地是情绪上的原因引起的。由此，他对女人普遍地也产生了一种极度的不信任感，尤其是对他的母亲，他有着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与之相反，弗洛伊德的母亲对孩子则是爱护有加，甚至于带有一种敬慕，而他的父亲总是不苟言笑，无疑是家里的

权威。因此毫不奇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一种父权式的心理学，极为强调良知、责任和惩罚恐惧。弗洛伊德的“超我”实际上是男性的，而非女性的。相反，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则完全是根植于母性的，它所关注的是女性的形象，并把她既看作是吞食者和毁灭者，又看作是保护人；这些概念真正进入精神分析学完全要得益于麦兰尼·克莱因 (Melanie Klein) 的发现。荣格对超我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甚至还在一个地方攻击它的构成是不合理的。但是，他对努力发展人格却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想以此使人格摆脱母性环境的束缚。

成长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和这样的一个家庭，荣格在其一生中必不可免地要对宗教问题投以极大的关注。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许多年轻人而言，要他们领会近百年之前正统观念的破灭，理解那时候的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念的怀疑，甚至更糟，被迫从内心放弃他们的信念，这可能比较困难。然而，只要稍微看一下“牛津运动” (Oxford Movement,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公教的一次复兴运动，其主要运动形式是编写发行小册子或丛书，故又称书册运动，代表人有皮由兹、纽曼、格拉兹顿等——译者注) 的历史，看一下纽曼 (Newman) 的 “*Apologia pro Vita Sua*” (《为生命财产辩护》，该书为牛津运动著名代表人纽曼的一部精神自传——译者注)，或者格拉兹顿 (Gladstone, 英国政治家，亦参加过牛津运动——译者注) 的书信，就可以使那些对上面的情况还持怀疑态度的人确信，宗教问题的确是十九世纪一些最活跃的心灵首要关心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不单单只是专业的学术问题，它还是人们所深深感受到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曾激起人们强烈的情感，甚至影响了他们整个人格。

荣格的心理学大都可以看作是他力图为他曾受其熏陶，可是在年少时期就开始反抗的正统信念寻找一种替代物的尝试。弗洛伊德的父母则没有让他面临此类问题，因为他们信奉的是犹太教信念，但并不坚定；而弗洛伊德从孩提时候开始就甘愿做一个怀疑论的不可知论者。

荣格是在乡下长大的，在后来的生活中，他曾不厌其烦地强调乡村的这种童年经历对他的良好影响，尤其是在对待诸如诞生、死亡和性这类自然现象上，使他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态度。他还满有信心地发现，乡下的农民和他一样，对那些神秘的、不可理解的话题也怀有兴趣，这些话题比如宗教，在他的作品中——从他早期的第一篇论文到他后期的关于飞碟的论述——曾不断地出现。要想理解荣格，就必须记住，对他面言，仅有自然科学是不够的。弗洛伊德就不是这样。凡理性主义所无法解释清楚的超自然现象通常总是有一定的背景，这一点在十九世纪末期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心灵，也十分强烈地吸引着固执而又有点悲观主义倾向的弗洛伊德。荣格在他的自传中，曾谈到一个不朽的世界，并把它看作是这个短暂易逝的世界的对立面。显然，对他而言，这样一个世界永远都是真实存在的。

在九岁之前，荣格一直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直到那年他的妹妹出生才结束这种状况。尽管他对乡村学校的同伴十分热情，可是他在智力上却过于超前，因此缺少唯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培植起来的共同的友谊。荣格为人热情，富有同情心；但是，从他对自我的记述中判断，他似乎很难轻易获得真正的友谊。他在童年时期的强烈的孤独感可以从他后来作的自我分析中得到很好的解释；但是，和大多数其他的独

生子一样，荣格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在许多方面无法和他的同时代人取得一致。每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就会浮现出来；并且具有特色的是，他的自传几乎没有谈及他的私人关系。例如，他的妻子就几乎未被提及；只是在索引里有一条关于婚姻的条目，他写道，“婚姻，替罪羊的神秘”，而在对妻子的死的唯一评述中，他写道，“1955年我妻子死后，我感到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责任，那就是必须成为我自己。”^①对孤独的这种偏爱恰好可以解释一点，即为什么荣格的心理学主要地关心的不是人际关系，而是被认为发生在个人心理的神秘深层的人格成长与发展的历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格的发展有它的终点，那就是与他人建立起一种成人式的关系，他简洁但不全面地把这个终点称之为“生殖阶段”；这个概念实际上包含有比性更多的含义。荣格的观点则是，人格发展的终点在于个体心灵自身内部的统一或平衡，它与和他人建立关系全然无关。

荣格最初的愿望是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他家境贫寒，无力承担将他送到比巴塞尔——他从十一岁开始就在这个城市上学——更远的地方去学习的费用。巴塞尔大学没有一个教考古学的教师，于是荣格转而选择了医学。在学校提供的一笔助学金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业，并差不多已经决定要从事外科事业。就在这时，他偶然读到了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写的一本书。克拉夫特·埃宾主要为英语读者所熟知，他的这本手册并不是关于“性心理变态”的，而是关于精神病学的，荣格在此之前对这个领域根本没有引

^① 《回忆、梦与思考》，伦敦1963年版，第213页。

起注意。读完这本书后，荣格确信他必须专事这个完全没有注意的、被忽视的医学分科；他作出这一出乎意料的决定的理由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后来提出的心理学观点。克拉夫特·埃宾把精神病学说成是对人格成长极其重要的一门学科，以致于这本手册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主观想象的印记，并受到作者自己的人格的影响。这个指责在今天看起来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荣格并没有因为精神病学缺乏这种客观的和科学的地位而厌弃它，而是立即被它强烈地吸引了。他对自然科学怀有兴趣；他十分清楚客观性的必要性。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内心对宗教沉思、哲学，以及对价值和意义的探究的热情；而要把严格的科学标准运用于他感兴趣的这些东西是有困难的，因为在那些领域，主观性总能找到它的位置。在荣格看来，精神病学大概可以满足他想调和内心里这些相互对立的方面的愿望；实际上，对相反的东西进行调和乃是贯穿荣格整个著述的一个主题。公正地说，在调和主观性和客观性这个特殊的对立双方方面，荣格算不上十分成功。一方面，他把他的思想说成是一种主观性的自供，因此拒绝承认它们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客观精神”（集体无意识的代称）是完全独立于个人经验或主观性的任何印迹的一种心理功能。当然，没有人能是绝对客观的观察者，但是，荣格却反复强调说，他仅仅只观察事实，并力图对它们进行分类。他的这一声明与他反复声称的任何观察者都不可能避免从个人猜想开始这一点常常显得不相一致。实际上，荣格曾承认，他自己和弗洛伊德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方面就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人进行观察都是以各自对人类本性的不同假设为基础的。

当荣格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他就参加了“扶占”实验。一位年仅十五岁半的通灵女孩声称她是从死去的亲属和其他亡灵那里接收信息的。其中有一个亡灵能几乎准确无误地讲高地德语，而那个年幼的女通灵者在没有阴魂附体的正常的清醒状态下只能讲瑞士德语。如此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格居然在同一个女孩身上出现，这一现象引起了荣格的兴趣；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也是他的医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便是《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和病理学研究》，其理论基础就来自于他对这个女孩的观察。我在上面已经提过，荣格认为他的母亲具有两种人格：日常的和非日常的，后者常常表现为是前者已经表现出来的对立面。他也很早就以同样的方式来认识自己。在十二岁那年，他就产生了一种观念，认为自己也存在两种人格；一种是学童，他孤独，对自己无法把握，还有点难以适应世界；另一种是一个具有强大权威的老人，他令人肃然起敬，威严懔懔，强大有力，并且可以把握自己。可见，这里说的还是一对对立双方，这一次它们表现为分离的两种人格，而不仅仅是同一人格的不同方面，上面已经提到的荣格对“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兴趣就属于这种情况。

对同一个人的心灵的不同方面加以人格化和进行命名的这种倾向贯穿于荣格的整个一生。因此，他的某些原型，尤其是“阿尼玛”(anima)、“阿尼姆斯”(animus)和“智慧老人”(wise old man)都是以这种方式人格化的。而且，荣格还激励他的患者去同这些“来自于无意识的形象”进行对话，就好像它们是外部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人。的确，对荣格而言，这些形象可能和他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交往的人同样的真实。他用来描述这些形象的语言表明，正如通灵者们所相信的，荣

格也认为那些形象就存在于“不朽的世界”中，它们一次又一次通过个体心理表现出来。例如，在他的自传中，荣格提到了一个产生于他的梦的形象，他给它取名为“菲勒蒙”(Philemon)。他说，这个形象教会他认识心理的客观性和心理现实。通过和它进行对话，荣格确信菲勒蒙具有超常的洞察力，能激发他内心的许多思想，这些思想他自己从来不曾意识到。当然，大多数人，尤其是具有创造性的人都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思想“即将形成”；疑难可以在睡梦中得到解决；心理活动还存在许多其他的表现形式，它们不受意识控制，也不是缜密的逻辑推理的产物。但是，却极少有人承认给这些“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用荣格那样的方式加以人格化的必要性，他们至多只是承认对这些心理活动的生理部分如肝或肾进行人格化的必要性，因为它们的功能活动是独立于意志的。荣格对命名和人格化的偏爱肯定是始自于他在孩提时期对母亲和他自己的认识；也始自于他对那个通灵女孩的观点心甘情愿的接受，即她把自己说成是代言人，通过她的言说，那存在于“彼岸世界”的至高存在便会显明自身，为众人所认识。这正是荣格心理学中令有些人感到不愉快，以至于他们也看不到荣格的极有价值的洞识的方面。

顺便作一有趣的说明。荣格和弗洛伊德两人都是通过观察歇斯底里的症状开始其心理学研究的；因为那个十五岁半的女通灵者无疑会被精神病医生作出这样的诊断。弗洛伊德的研究致使他着力强调歇斯底里中的“压抑”；也就是说，那是对意识层面的思想和情感的一种推拒，它会令有意识的自我感到不舒服。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作为人格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一直稳固地处于支配的地位；精神分析学的目标就是

要把本我转换为自我。“本我在处，自我必在”。荣格尽管也认识到了压抑作为一种心理学机制的有效作用，但他认为心灵内部的分裂和破碎要更为重要；他倾向于把破碎的部分看作是各种交替的人格，它们与自我具有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甚至能够取代自我。“多重人格”的病例是十九世纪的精神病医生所钟情的，他们通过不慎重地运用催眠术激励其歇斯底里患者继续保持交替的人格。和弗洛伊德一样，荣格不久也放弃了催眠术，但他仍然把自我看作只是众多“人格”之中的一种，而不是人的心理的中心主导方面，似乎所有其他的方面都应当从属于它。有人可能会过于简单地说，弗洛伊德的主要兴趣在于揭示隐私，而荣格的主要兴趣则在于调和心理内部的“人格”的冲突。

荣格对分裂和破碎的这种强调由于其临床经验而进一步被强化了。1900年12月，在取得行医资格之后，荣格得到了一个职位，就是在苏黎世的布勒霍尔兹利（Burgholzli）精神病医院做助理医生；他此后的余生都是在这个城市的郊区度过的。在这里，他的兴趣主要在于精神分裂症（在那时，这种病又叫做“早发性痴呆”）。他通过观察发现，在精神分裂症中，病人的人格并不只是分裂成两个完全清晰可辨的部分，而是一些碎片，也就是说，是破碎的而不仅仅是分裂的。不过，在这些碎片中，还存在一些具有某种连续性并能同医生进行对话的“声音”。而且，正如那时许多在精神病医院工作的精神病医生已经注意到的，荣格也发现，在慢性精神疾病长年的发病过程中，病人的“自我”尽管是难以观察的，但或多或少地还是完整的。如果慢性精神分裂变成了生理疾病，那么常常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病人“正常的”人格，例

如他的自我，还会继续保持它的最高地位，故而他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还会正常地交际和行动；只有当生理疾病好了以后，他才会再次旧病复发。对于这种现象，用弗洛伊德关于自我、超我和本我的精神结构的术语是难以解释清楚的，除非人们根据习惯认为那个自我比弗洛伊德设想的——至少在他早期的作品中——还要容易分裂成多重“自我”。

在布勒霍尔兹利的这段时间里，荣格还做了另外一些观察研究，这些研究使他得出了关于“集体”无意识的假设，以反对单一个人的无意识。他在哲学、比较宗教学和神话方面的知识使他能够在这些材料和精神分裂患者的幻想与妄想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还断言，精神分裂症可以说暴露的是更深的心理层次，这个层次，用个人压抑和幼儿时期的心理变化的理论是无法解释的。

在晚年的一部著作中，弗洛伊德得出了和荣格相接近的观点。他写道：“梦还显露了这样的材料，它既不会是源于梦者的成年生活，又不会是源于他遗忘了的童年，我们只好把它看作是原始的遗产，它与生俱来，先于任何个人的经验，而受祖先经验的影响。在最早人类神话和残存的习俗中，我们会发现这一种系发生的材料的原型。”^①

荣格的思想大部分是源自于他在布勒霍尔兹利工作时的临床经验，明白这一点是颇为重要的。弗洛伊德则从未在精神病医院工作过，哪怕是做极短时间的医疗助理，因此他几乎没有同精神病患者接触的经验，他基本上认为这些病人完全超出了精神分析学的范围。他最初的理论首先是基于歇斯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伦敦1964年版，第166~167页。

底里现象，其次是强迫性神经病。但是，荣格却从1900年至1909年一直在精神病医院工作，直到1909年他才终于从医院辞职去从事私人的心理治疗实践。即便是在那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也没有放弃对精神分裂症的兴趣；他的许多病人仍然或者是濒临边缘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是明显的精神分裂症。实际上，从荣格的卷帙众多的著作中记载的少许病历看，他对神经病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同弗洛伊德断交以后，他的选集中就极少有神经症的病历；其实，即便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我们也根本看不到他对神经症病例的研究。弗洛伊德就不一样，他就分析了诸如“狼人”、“鼠人”或“小汉斯”一类的复杂病案。尽管荣格为人宽厚仁慈，富于同情心，但他通常还是对观念比对人更感兴趣，因此他很快地就对解决家庭内部的那些情绪纠纷感到厌烦了，他认为这种作法不过是靠一般的心理治疗业务来赢得可靠的固定收入而已。

荣格在布勒霍尔兹利医院的期间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对此我在后面将会加以讨论。然而，在这里，我更为关注的是他的这一经历是如何孕育他的著作和思想的，而不是那些思想本身。其次，影响他一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他与弗洛伊德的第一次相遇。尽管几年前荣格就已经熟悉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并且1900年，《梦的解析》首次出版时，他就读过这本书，但是，实际上，他和弗洛伊德直到1907年3月2日才真正见面。由于人们常常认为荣格是一位变节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因此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在荣格首次与弗洛伊德会面的时候，他已经有了6年的精神治疗经验，并已出版了自己的具有独到见解的著作，而且作为一个年已30多

岁的单身汉，已开始——尽管还不明确——勾勒出了一些颇具特色的“荣格式”的思想，这些思想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全然相左。不过直到1913年，这些思想才真正得到了完整的表述，当时荣格已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了，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人们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对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性质，弗洛伊德的信徒和荣格的信徒可能永远都无法取得一致，前者极力强调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把荣格说成是异端；后者则极力低估它的作用，也许他们认为，荣格曾一度比他所表现的还要独立自主。事实上，双方可能都属意气之争。必须记住，弗洛伊德要比荣格大19岁，在荣格和他相识的时候，他已经在学术界挑起了轩然大波。无论如何，荣格事先肯定知道，如果他还像在和弗洛伊德结下私交之前写的一些早期论文中做的那样，继续声援弗洛伊德仍在印行的作品，那必定会对他的学术生涯造成不利影响。这个预感自然会使他越发激烈地为弗洛伊德辩护；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对我们感到受到了不公正的遗弃的人都容易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因此会极力为他们辩护。还要记住一点，荣格对他的父亲较少尊敬，尽管他认为父亲为人慈祥和蔼。因此，他必定容易“迷恋”上一个年龄比他大，学识上能够赢得他的敬慕，且有勇气提出有争议的思想的人。而就弗洛伊德而言，他也十分需要得到在精神病治疗机构工作而又和维也纳他本身的圈子没有联系的人的支持响应。荣格是瑞士著名的精神病医院的一名教师和研究人員，他的意见必定能受到世界各地的尊重。而且，与弗洛伊德圈子里绝大多数的人不一样，荣格不是犹太人，这一点弗洛伊德本人在一封给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的信中特地强调过。因此不用奇怪，荣格一度

似乎成了弗洛伊德的“爱子”，而弗洛伊德就像是荣格的“父亲”。不管这件事的真实性如何，反正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热情地交谈了十三个多小时，并到各自的家中作了互访，还决定尽量利用通信和各种开会的机会进行合作。收在《荣格选集》第四卷中的《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学》一文显然就是这种远距离合作产生的成果。当然，他们两人一开始就在许多方面意见不和，这也是事实。不论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感情是怎么样的，反正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不加批判的信徒，尽管——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在合作期间，他抑制自己不作批评，暂不考虑自己的判断。在写作《无意识心理学》，后改名为《变形的象征》一书时，荣格意识到，他的有些观点与弗洛伊德有根本的区别，因此，该书的出版极有可能使他失去弗洛伊德的友谊。这一想法严重地干扰着荣格，以致于他不得不停止写作达两个月之久；这个事实证明了在他和弗洛伊德的关系中，情感对于他该是多么重要。必须注意，写作乃是单独个人的事，在那里，作者常常会力图阐发他自己的、不会因他人的影响而有所沾染的观点。显然，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荣格因自己的诚实正直而被迫重新发起了他一直抑制着的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并且又一次，他听从了他自己的独立判断。如果有人要求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这两个人之间的不同，我会告诉他，这种不同就在于他们两人的基本价值观。弗洛伊德无疑是把最高的价值归之于极度亢奋的性欲的释放，而荣格则把最高的价值归之于宗教经验的统一。因此弗洛伊德热衷于把所有超自然的、有情感意味的经验解释为是性的产物或替代品，而荣格则倾向于把性欲本身也解释为是象征；认为它具有“超自然”的神秘意义，因为它体现